

中华文化是各民族文化的集大成。我国各民族创作了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伟大作品,传承了格萨尔王、玛纳斯、江格尔等震撼人心的伟大史诗,建设了万里长城、都江堰、大运河、故宫、布达拉宫、坎儿井等伟大工程。中华文化之所以如此精彩纷呈、博大精深,就在于它兼收并蓄的包容特性。

摘自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2019年9月27日)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听文物讲故事②】

青花双凤纹高足杯：见证元代路级城市的多元繁华

□本报记者 高瑞锋

元代的一个月夜,无风。繁华的集宁路古城万籁俱寂。一富庶人家的偏僻厢房里,油灯微弱,男女主人把碗、瓶、壶、杯等珍贵瓷器小心翼翼地放进地下土坑里的大陶瓮里。之后,填土,踩实,堆上破柜烂柴,厢房看上去还是之前一样的脏乱不堪。

这是根据考古现场脑补的画面。

作为今人的我们,也许得感谢集宁路古城富庶人家月夜藏宝。若不是如此,600多年后的我们,也就不可能得知元代城市的繁华,也不可能领略到古代文明交流交融的深广。

代表元高超制瓷技艺

内蒙古博物院 交融的魅力 展厅,青花双凤纹高足杯静立在众多珍品中,特立而不炫耀。

它高9.5厘米,口径9.4厘米,足径3.4厘米,碗状式的杯口,竹节似的高圈足,细白的胎质散发着幽光,弦纹装饰着内、外壁口,两只青花发色浓翠的凤鸟伸着细细的脖子,舒展着双翅,似乎要从外壁上飞跃而出。

这件元代珍品2003年出土于集宁路古城遗址,或许就是月夜藏宝中的一件。

元代集宁路古城遗址,位于乌兰察布市察右前旗巴音塔拉乡土城子村,北靠110国道,南临黄旗海,西距

乌兰察布市府所在地集宁区25公里。98年前的1923年,这里曾发现一座石碑,上有“集宁路 皇庆元年(公元1312年)字样”。据此得知,这里曾为元代 集宁路总管府 所在地。

2002年至2005年,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组织乌兰察布市博物馆、察右前旗文物管理所,联合组成集宁路考古工作队,开始对这里进行考古发掘。

内蒙古博物院院长陈永志,时任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考古工作队队长。回忆19年前的发掘,他记忆犹新。

发现了大量金、元时期的瓷器,

出土完整瓷器500余件,可复原瓷器标本7800余件,其他各类珍贵瓷器标本上万件,涉及磁州窑、景德镇窑、龙泉窑、钧窑、定窑、耀州窑、建窑等七大窑系,还有高丽瓷器中的珍品。陈永志说,其中釉里红玉壶春瓶、钧窑香炉、景德镇窑青花高足杯、青花盏、青花梨形壶、龙泉窑三足樽等61件瓷器是最为重要的藏品。这些瓷器制作精美,品相极佳,青花、釉里红、枢府釉、青瓷、黑瓷等各个品类均有,代表了元代高超的瓷器制造技术。陈永志说。

2003年,元代集宁路古城遗址位列当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

明确元青花创烧时间

元青花瓷,历来珍贵。为何?

存世量少首当其冲,目前国内不足400件,青花颜料钴珍贵,产自西亚,纹饰较之唐宋更加精美,釉质独特,无法仿制。

集宁路古城遗址在发掘中,共发掘了9个瓷器窖藏,出土了8件青花瓷,成为整个考古发掘的最大亮点。其中在一户有30多间房屋的富庶人家,则出土了6件完整的景德镇窑青花高足杯,这是目前出土元代青花高足杯最多的窖藏,震惊了现场所有考古人员。

这些标有纪年和名号的瓷器的出土,除了珍贵,还颠覆了学术界的一个认知。在此之前,学术界通常认为,元

青花瓷的创烧是在元朝至正年间,即14世纪中叶。

集宁路古城遗址出土的青花瓷器,从器形、釉色、胎釉装饰及画面构思等诸多方面看,其烧造技术已经相当成熟。陈永志说。

史料记载,1351年(元至正十一年)元朝爆发了红巾军起义之后,全国各地农民起义风起云涌。1352年,生产青花瓷器的江西景德镇也覆巢无完卵,到公元1354年(元至正十四年)元朝在江西各个地方的政权次第垮台。

没有中央政权强有力的管理和稳定的社会秩序、生产秩序,不可能烧制出质量上乘的青花瓷器,特别是烧制高质量青花瓷器所需的钴料必须从西亚输入,战乱必然会给原料供应带

来困难。陈永志说,当时南北交通因各地农民起义而被阻断,这批珍稀且娇贵的青花瓷器很难在战火纷飞中运至位于北方的集宁路地区。

陈永志说,从景德镇到位于漠南草原的集宁路,距离数千公里,人畜辗转运输,一路坎坷,保守估算,路上所用时间至少需要三至五年,再结合集宁路古城遗址出土的纪年瓷器,最晚的年号为至正元年。据此推断,这批工艺成熟的元青花瓷器为1341年(元至正元年)之前,约1313年前后(元延祐年间)的产品。

由此,结合考虑瓷器烧造技术有一个产生、发展和成熟的过程,从而推断元青花瓷器极有可能在至元初期就创烧成功了。陈永志说。

见证集宁路商贸繁荣

高足杯又称马上杯,通常用作酒具,是元代常见的器皿。其实,它就是一个固定样式,除了瓷质,还有其他材质的高足杯。内蒙古博物院 交融的魅力 策展人张彤研究员说:这件高足杯上的凤纹,是中华传统文化里惯用的纹样,它出现在元代常见的高足杯上,可见中原文化和北方游牧文化的融合。

两种不同背景文化的融合,除了体现在瓷器上,还有哪些方面呢?随着考古发掘的逐步深入,一个商贸繁荣、高度融合的元代城市呈现在大家面前。

史料记载,元朝统一全国后,实行政省制,下设路、府、州、县,全国按地区分为十一个行省,阴山以北的漠北瀚海

地区设为岭北行省。建立于1192年(金明昌三年)的集宁路古城在元代被升为路级(相当于今天的地级)城市,是北方与中原内地进行商贸交易的市场。

按发掘确定出的城垣结构测算,集宁路古城的北城墙长为640米,西城墙长为940米,古城呈长方形,城垣面积为60多万平方米。

城址的中西部中心地带,是集宁路古城进行商品交易的主要场所市肆所在地。市肆遗址东西长100米,南北宽60米,一个个“门脸房”房址分布于十字街道两侧,均由正南北向多开间的多组房屋组成。

集宁路古城遗址除出土了大量瓷器外,还出土了大量钱币、塔坩、铜

渣、料珠、箭镞、铁刀、铁钉、犁耙锄,以及骨器具、皮革加工器具、牛马用具、首饰器物等。这些实物说明元代的集宁路古城作为一座塞外商业城市,城市功能较为完备,商品交换内容广泛,它与岭北蒙古各部贸易往来繁忙,是岭北行省通往中原内地的物资集散地或中转处、加工场。在这里,农与牧交流,蒙古、汉、女真、契丹多民族交融。

陈永志说,元朝陆路贸易的发达程度不亚于海上贸易,而位于古阴山(今大青山)以北农牧结合带的集宁路古城即是欧亚商贸往来与文化交流过程中的枢纽与桥梁,是草原丝绸之路东端的一个重要起点。

(图片由内蒙古博物院提供)



一言

让历史说话 让文物说话

◎苏永生

文物承载灿烂文明,传承历史文化,维系民族精神,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是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深厚滋养。要把凝结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文物保护好、管理好,同时加强研究和利用,让历史说话,让文物说话,在传承祖先的成就和光荣、增强民族自尊和自信的同时,谨记历史的挫折和教训,以少走弯路、更好前进。

每一种文明都延续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我区作为民族文化大区,不但拥有辉煌灿烂的发展历史,而且拥有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昭君墓、元上都遗址闻名中外,红山玉龙、居延汉简、匈奴王冠等文物久享盛誉。作为历史文化的一部分,文物在镜鉴文明、启迪后人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和作用。抢救、保护、阐释、开发、利用好各种文物,让收藏在故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推动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文物工作者和全社会共同的责任。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坚定文化自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意义重大而深远。

让历史说话,让文物说话,要保护好文物。文物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承载者与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物证,记录着各民族在不同时期的社会制度以及生产生活的历史轨迹,具有不可再生性和不可替代性。保护文物功在当代、利在千秋。中华文化发展繁荣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条件。保护历史文物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必然要求。

让历史说话,让文物说话,要发挥文物见证历史、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功能,激发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的伟大祖国的历史。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恢宏激荡,各族先民胼手胝足、披荆斩棘,共同开拓了祖国辽阔的疆域,共同书写了悠久的历史,共同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共同培育了伟大的精神。

让历史说话,让文物说话,要增强各民族的文化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让历史说话,让文物说话,就是要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开展历史文化研究,挖掘蕴含在各种文物中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和深刻内涵,传承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形成各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团结奋进的强大精神纽带。

【同心共筑中国梦 征文】

辽上京遗址：民族文化融合的见证

□尹静雅

辽上京遗址位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巴林左旗林东镇东南15公里处,1961年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根据《辽史·地理志》记载,辽上京城址由北部的皇城和南部的汉城两部分组成,平面略呈“日”字形,总面积约5平方公里。

皇城平面呈不规则的六角形,皇城由外城、宫城两部分组成,宫城位于皇城中央偏东北,地势相对较高,宫城内部遗迹大多保存较好,宫殿多集中于西北部,按照中心对称的形式进行排列,东北部相对空旷,推测这里可能是曾经安置毡庐的地方。城东南设有回鹘营,这里生活着来自回鹘的商贩,城西南设同文驿、临潢驿,是使馆区。位于城西南高地上的西山坡遗址,是辽代重要的佛寺遗址,规模庞大。

汉城位于皇城南面,《旧五代史》记载,上京城以南为汉人起居生活的城区,因此将其命名为汉城。汉城之北及东南现有两条小河,会于汉城东北角,汉城保存状况较差,东、南、北三面城墙多已被夷平,西墙也所存无几。

辽上京城始建于公元918年,是游牧民族契丹族入主中原后建立的第一座都城,也是辽早期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中心。

辽疆域广阔,横跨游牧和农耕两个区域,生活着契丹、汉、奚、渤海、党项等众多民族。为巩固政权和维护边疆安宁,辽推行“北南分治”,以汉治汉、以夷制夷的统治政策。这一政策的主要内容是,适应不同民族不同状况,因袭其传统的经济生产方式、政治组织形式,使用原有的制度和文化,而上京城遗址的布局也正是这一政策的体现。

这种“因俗而治”的统治方式,在当时促进了辽的政治团结和民族联合,稳定了社会秩序,加速了文化融合,使辽作为一个少数民族建立的多民族国家维持统治200余年并成为中国北方举足轻重的大国。

辽代建立之初,虽受到汉文化的冲击,但在思想意识层面,依然保持着契丹民族最初的崇拜、信仰和生活习俗,所以辽上京遗址,房屋建筑面向东方,有专门安置毡帐的区域,但到了辽代中后期,不断吸收中原文化,他们的思想意识发生了根本改变,开始以“中国”自居。

辽灭亡后,西辽在西域推行汉文化,后来中亚和俄罗斯将中国称为“契丹”,就是受到了辽的影响。

契丹族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逐渐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中,使“中国”内涵及外延不断扩大,地理疆域由中原农耕区扩大到北方牧区,文化也变为融合了游牧文化的礼乐文化,民族也包括了辽统治下的契丹、党项、奚等多民族,为后来的中华民族形成奠定基础。而且,“分而治之”作为辽留下的宝贵经验,已成为金、元、明、清等历代王朝在统治众多民族时采用的共同标准。

历代统治者从思想文化、政治制度、民族关系等诸多方面采取措施,不断促进各民族在交往中深度融合,动态地塑造了民族共同体意识,进而推进了多民族、多文化的“多元一体”格局。特别是到了近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苦难进程中得到淬炼、升华,成为凝聚各民族的精神力量。

历史证明,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打破狭隘的本民族文化认同,有效弥合各民族间的文化隔阂和价值冲突,才能凝心聚力,铸造共同的精神文化基础,激发主体意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辽上京遗址